

【民族史】

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程与经验研究

孔德猛 陈 晨 章曼姝

【摘要】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经萌芽与形成、探索与曲折、恢复与发展、创新与完善四个各具特点而又一脉相承的发展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就需要正确处理好“三个结合”的关系,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相结合,坚持中华民族所处的特定历史方位与不同历史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任务相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以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为立足点,以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为落脚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历程;基本经验

【作者简介】孔德猛,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聘教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理论宣讲团成员;陈晨,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章曼姝,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40)。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23.2.1~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程及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研究”(项目批准号:22VSZ065)、2021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建党百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历史经验及铸牢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BDS005)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①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要处理好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已有大量聚焦某一特定时段的研究。^②但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贯穿起来,研究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年变迁走向和发展规律的成果比较欠缺。同时,现有研究往往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研究,^③对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规律的研究也相对较少。本文将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区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时代时期四个发展阶段,并立足百年发展的长时段视野研究每一时期的基本经验,以期为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智慧和学理支撑。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发展历程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首次使用“中华民族”^④这一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回顾民族工作百年奋斗历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经萌芽与形成、探索与曲折、恢复与发展、创新与完善四个各具特点而又一脉相承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仅反映了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特点,而且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解决我国民族问题道路的历史进程。

1. 萌芽与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任务是注重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时更注重阶级斗争。这一时期大致包括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四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萌芽,而后两个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逐渐形成。

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土地革命时期,党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知处于萌芽状态。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封建统治者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当时我国民族工作的方向。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很简单:支持一切革命民族。”^⑥根据恩格斯这一理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示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从此,马列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传入中国。我们党关于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依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独立、分离、建立联邦或区域自治等有关民族理论,反抗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要妥善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团结的生动写照。

二是全面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知逐渐形成。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党领导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废除一切民族压迫制度,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⑦在这一时期,如何把经济文化差异很大的各个少数民族联合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党在工农学运、统一战线、长征等政治实践中逐步加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并在上述活动中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然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形成并确立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动员各少数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⑧全民族抗战的经验超越了阶级、阶层、党派、民族,把“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逐步接受“中华民族”这一现代民族符号,以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为基础思考中国现实问题。但是,阶级斗争的结

束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就此消失。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更加复杂,以铲除阶级压迫为目标的民族理论可能会对民族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切断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连续性。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尤其是我党创立之初,这一局限性也在所难免。

2. 探索与曲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任务是确立国家政治符号以及消除民族不平等的根源。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种进步力量奋力实现的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入全面探索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后,主要通过确定国旗、国歌、国徽等现代国家的标志性政治符号的方式展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索。另外,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增强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央人民政府派出若干“中央访问团”^⑨赴西北、西南、东北、内蒙古等民族地区调研。除了宣传民族平等政策外,访问团的主要任务是拜访各地少数民族,摸清他们的民族名称、人数、语言以及风俗习惯等,这为民族识别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生产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在全国进行“一化三改”的形势下,我们党关于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引导翻身解放的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⑩“齐心协力建包钢”和“三千孤儿入内蒙”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族团结的历史佳话。

然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出现了曲折,这集中体现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⑪1958年4月,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发生反革命叛乱。鉴于这次严重的教训,中央批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里所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是针对循化反革命叛乱这类严重阶级斗争事件提出来,并且还在前面加上“在阶级社会里”的限制词。但是,这个说法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批判统战、民族工作方面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被扩大化,并且去掉了前面“在阶级社会里”的限制词,

被提升为“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这样一来,“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就变成一个没有时间、地点、条件的普遍命题。民族和阶级、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被混而为一,即不论什么时代,也不论什么国家,只要有民族问题,其实质就是阶级问题。由此可见,“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观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表现。这条路线否认阶级消亡后民族问题还会继续存在,把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说成是剥削阶级的问题,并以此为根据把党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看作“修正主义路线”。

3. 恢复与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任务是从阶级对抗转变为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团结各族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为纠正“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了此前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转变,提出民族问题的性质不是阶级问题,而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同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统战部撰写的题为《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澄清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

澄清民族问题的实质和民族工作的重点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恢复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恢复各级民族工作机构的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保护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平等权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等。这些措

施为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尤其是费孝通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⑩理论。基于这一论断,中央先后在1992、1999、2005年召开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分别通过《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等文件,这对我国民族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关于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基于江泽民“三个离不开”^⑪和胡锦涛“三个不容”^⑫,超越阶级、阶层、民族和党派之上的符号来凝聚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⑬

4. 创新与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任务是基于“四个与共”(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和“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理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⑭,并把它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这不仅是深刻总结建党百年民族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得出的重要结论,而且也是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围绕这一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目前中华民族处于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为一体,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深度融合,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实现互持,三方面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再次被强调的历史方位。这一历史方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⑦站在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阶段”的顶层设计相衔接,做出更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布局。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经验

建党百年来,我国的民族工作不仅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基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时代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年历程,总结民族工作“三个结合”的基本经验。

1. 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首要经验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⑧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有长远的历史源流,其形成过程与民族理论建设的艰辛历程交相辉映、一体同源,既最大程度地完成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移植、融合与进一步发展,又尽可能地借鉴了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卓越之处。无论是马克思的“民族平等”观念、恩格斯的“民族自决”意识、列宁的“民族自决权”^⑨理论还是斯大林的民族自治政策,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都不可避免地以民族国家为现实的切入点,而后必然地面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带来的种种挑战。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还不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矛盾发展演变的趋势,那么到列宁斯大林时期,少数民族在地方的自治权利问题,取代了全民族群众从统治阶级剥削中解放的问题,上升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我国基于苏联模式采用“联邦制”的国家形式,认为

“联邦制”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然而,这一道路对当时我国的民族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改变苏联革命模式的负面影响,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命题。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苏联的“联邦制”逐渐转向民族自治。1947年成立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付诸实践,这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民族问题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完成了从思想到话语再到实践的转变。

2. 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相结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主要表现为歧视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限制和剥夺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企图抹杀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民族差别。其实质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国内民族关系上的一种反映,是一种歧视、排斥、压迫较小民族的主义。“大汉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既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各民族应该融为一体,而它们的民族语言则应该变成统一的共同语言,那么现在已经是消灭民族差别和放弃支持以前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发展民族文化的政策的时候了。这一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正确,但实际上错误。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⑩。

地方民族主义亦称“狭隘民族主义”,它以孤立、保守、排外为特征。表现为忽视民族团结在祖国统一大家庭中的重要性,力图在本民族的狭隘范围内闭关自守,各自为政;强调本民族的局部利益,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过分夸大本民族的特点。地方民族主义^⑪的实质是力图在本民族的狭隘范围内闭关自守,试图用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防御“大汉族

主义”。这一主义的危害在于产生“精致的民族主义”^②。其培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治或独立借口下鼓吹分化削弱各族群众的团结,为西方国家利用民族问题干涉我国主权打开缺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消除阻碍中华民族凝聚的因素,而以两种民族主义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显然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悖的力量。斯大林指出,“民族主义是在各边疆地区和各共和国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培养马克思主义先锋队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碍”。^③然而,如何实现各族人民的团结以及妥善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的问题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在全国,要注意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在民族自治地方,还要注意处理好自治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在处理这类问题时,要讲原则讲法制讲策略,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成员的一般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都归结为民族问题。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教育、疏导、化解的办法来解决。对于极少数披着宗教外衣,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旗号在国内制造骚乱甚至暴乱的犯罪分子,不论涉及哪个民族、信仰何种宗教,都要依法处理。

3. 坚持中华民族特定历史方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任务相结合

建党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方位,而这四个不同时期的历史方位由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为了更好地推动民族工作的开展,需要把中华民族面临的特定历史方位与不同历史时期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矛盾任务相结合。在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矛盾的判断经过几番调整,而每一次调整都对我国民族问题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废除一切民族压迫制度,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任务是从根本上消除民族不平等的根源。通过“一化三改”,实现了对民族资本家的和平赎买。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正确阐述,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但是1957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共八大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基于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我国的民族工作也受到严重冲击,错误地认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随着“文革”的结束,十一届六中全会纠正了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重新肯定了八大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论断,中国共产党的叙事方式从阶级对抗转变为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矛盾,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也呈现出重要变化,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融为一体。以这一历史方位为基础,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挥其凝聚力量、民族团结等方面的优势,助推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由此看出,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百年历程中,中华民族所处的特定历史方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目标处于变动之中。此时的目标成为下一个阶段的历史方位,而此时的历史方位又是上一个阶段的铸牢目标。因此,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用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培育目标从首尾两端框定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④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我国民族具体实际三者基础上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观念。

三、新形势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思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

聚了共识和力量。然而,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在此背景下,站在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的历史坐标上,回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总结其间的基本经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规律,为党领导人民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夺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形势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发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⑧因此,我们必须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邦畿千里,维民所止”。^⑨秦汉雄风、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今天,实现中国梦仍需中华民族的每一位成员都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叠加。这是我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也是民族工作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实现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激发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经过各族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2021年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已经顺利地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又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赶考之路”。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一“赶考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我们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国内外挑战。从国内看,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这一切必然会对我国民族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内民族地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甚至出现局部地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从国外看,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我国边疆民族

一些地区仍然相当活跃。他们利用民族问题打开缺口,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在我国面临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应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牢固树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2. 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新形势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足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⑩民族矛盾问题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依赖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复杂形势,要善于抓主要矛盾,进而明确有效破解问题的主攻方向。然而,民族矛盾问题的解决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何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面临复杂的困难。因此,民族地区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必须关注其民族性内涵,为从深层次破解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瓶颈提供理论支撑。

第一,“美好生活需要”的民族性内涵。在民族地区,“美好生活需要”的民族性内涵体现为:一是实现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量变,不仅要依靠移植或嫁接式的路径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更需要大力提升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实现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质变,不仅要实现民族发展、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尊,还要着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地区,日益增长的量要最终发展为美好生活的质,必须实现中华民族层面的升华性认同。从新时代民族性内涵的角度出发,能够为民族地区改革发展提供根本战略方向。第二,“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民族性内涵。这种“不平衡”的民族性内涵不仅表现为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民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同一民族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还表现为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同民族间发展的不平衡、同一民族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等;而“不充分”的民族性内涵表现在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如西部民族地区一般具有地广人稀的特

点,这导致了民族地区的教育、医疗、商贸等事业规模效应低、发展成本高,使民族地区在生态、文化方面的优势难以充分转化为经济方面的优势,最终形成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充分性。因此,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民族性内涵需要结合民族文化、民族经济、民族认同等进行具体分析。

3. 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是新形势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③抓住历史机遇,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各项优惠政策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落脚点和归宿。虽然全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方面,民族之间仍会发生一些矛盾。这反映出新时代各民族平等关系的背后掩盖着“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根本问题。“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最早由列宁在1919年2月《俄共(布)纲领草案》中首次提出,“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以便消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 and 隔阂的一切痕迹”。^④然而,“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为应然而不是实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大大加快,但是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沿海地区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并且这种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差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

实际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⑤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同全国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少数民族的振兴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密不可分。习近平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根本利益”。^⑥如何才能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获得较快发展呢?一是需要国家的扶持和发达地区的帮助。国家要加大对民族地区支持的力度,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民族地区的开发,要重点帮助民族地区建设一批对经济发展起重

大作用的水利、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尤其要重点解决民族地区“路”的问题,既要打通对内对外联系的“大通道”,也要畅通与“大通道”联系的“毛细血管”。二是民族地区更需要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努力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新的历史条件,坚持从本地地区的实际出发,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增强自我发展的“造血”能力,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因此,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就是要为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努力。

四、结语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伴随中华民族思想日趋成熟、中华民族话语不断丰富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必须从党的民族工作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只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才能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才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9页。

②参见何雄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贡献探究》,《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邓磊:《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路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常安:《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

③参见关键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伦理认同研究论纲》,《伦理学研究》2022年第4期;邹广文:《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结构》,《哲学研究》2021年第11期;于玉慧:《“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阐释的新向度》,《贵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范彬:《弘扬科学无神论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

④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萌芽阶段,已有关于中华民族一体同源、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思维,其中梁启超是“中华民族”理念的首倡者,他曾提到“大民族主义”理论。参

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69~1070页。实际上,“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经三个阶段:一是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二是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首次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三是1988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出“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为我们在新时代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启示。

⑤严格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29日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但为了上下文论证的一致性,在萌芽与形成、探索与曲折、恢复与发展阶段,暂且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提法。实际上,毛泽东在1919年提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概念。参见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页。

⑦《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⑧《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

⑨“中央访问团”成立的原因: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在民族地区建立政权和开展工作,巩固和建设边防,首先需要取得少数民族的支持。因此,当时的民族工作从疏通民族关系入手。党中央为疏通民族关系不仅成立了“中央访问团”,而且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其中前者是“走下去”,即政务院牵头组成西北、西南、东北、内蒙古四个团赴民族地区调研;后者是“请上来”,即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和内地参观。

⑩《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页。

⑪“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观点最早出自1958年中共中央批转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的批语。

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指中华民族是多个小民族构成的一个大民族(多元),中国是这种大民族构成的单一制国家(一体)。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46页。类似的观点参见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⑬参见1981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后来提炼为“两个离不开”。江泽民同志1990年视察新疆时提出“三个

离不开”思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三个离不开”是对“两个离不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⑭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三个不容”理论,即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

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5页。

⑯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页。

⑰《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1页。

⑱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页。

⑲参见《论民族自决权》,载《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9页;参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载《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9页。

⑳《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载《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64页。

㉑应当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和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民族习俗、民族文化严格区别开来。

㉒《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2页。

㉓《斯大林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52页。

㉔张淑娟、梁秋瑞:《历史方位与培育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础与方向》,《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㉕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21年8月29日。

㉖《诗经·商颂·玄鸟》。

㉗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7页。

㉘㉙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21年8月29日。

㉚《俄共(布)纲领草案》,载《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9页。

㉛江泽民:《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9月30日。